

作家周克芹长眠丘陇26年了。得知他走的消息那天,我就想写点文字,可是一直理不顺思路,而且话似乎也不好随便讲:说作品,世有定论;论生平,要靠专著;谈观感,过誉有违本心,求全又不近人情。

我和老周一水之隔,他工作过的简阳文化宫和四川省作协,也是我后来的单位。圈子这么小,凑在一起的机会应该很多,可说来奇怪,从1963年看《四川文学》,知道家乡有个周克芹,到1990年他辞世,其间将近30年,我俩的见面仅十余次,但我要用自己的视角来写他给我留下的点滴印象。

一

初次拜会老周,大约是1978年冬的一天下午。那时他刚进入公众视线,作为人才被安置到简阳文化宫工作。他住在接近公园大门一侧的办公室,门板作床,画案作书桌,三餐去园内招待所食堂,错过时间,就上小饭馆,生活得简单、简朴,以至简陋。

此前在电影里,作家总是一副不修边幅的形象。眼前的老周,与我的想象差别很大:一身老式干部制服,外披军用长棉衣,身材高大,略显佝偻,脸型瘦削,语音低缓,面带笑意,前额的皱纹和微微下垂的嘴角,透出风霜,像个有文化的乡干部。提到“文学”二字,他立即进入状态,言之津津,表情生动,让我见识了一个乡土作家的本色。

通过交谈,我对老周有了初步了解。他1936年10月出生,地点是简阳石桥镇外的一间磨房;在镇上念过几年书,辍学后参加过土改运动,做过农活;16岁进省城一家食糖联营门市当店员,17岁考入成都农技校。读书期间撞上“大鸣大放”,1958年毕业时,被结论为“政治不及格,不予分配工作”,遣返回乡一干20年。待在农村,当然也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同为撒一捺,人与人不一样。“政治不及格”,等于钤刻“黄金印”;遣返回乡,无异于枷号放逐,关进牛棚。人抵挡得住一时的风雨,抵挡不了长期的折磨,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理想。

但老周从未放弃理想,精神充实,个性饱满,风雨对于他,反而起到磨砺和助长的作用。他安处困寂之境,甘走崎岖之路,当过民办教师、农中教师、保管员和会计。尘土衣冠,江湖心量,脚下是黄土,屋外有青山,一条溪水,几片白云,让他感念不尽。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乃至毕生心事,尽在此地,对这方山水,滋生出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这也是中国自有文学始,就在作家血管里流

■ 纪念

动的基因。他要写的事情近在身边,要写的人物站在眼前,他的所思所想,与左邻右舍息息相通。写作是兴之所至,习惯使然,没有外来压力,也未长时间中断,因此才会日积月累,水到渠成。艰难困苦造就了老周。

我离开时,老周讲他正在写出版社约定的一个“中篇”(后来发展成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如果顺手,明年可望正式出版。他拿出一本《石家兄妹》签名相赠,并说明它是“文革”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第一套文学丛书的一种。这套丛书中,工农兵作家各占一册,其他的作者还有工人作家火笛、军队作家邹仲平。后两位此后我也有幸认识,邹仲平后来转业担任《四川文学》副主编,1982年秋把我引进这家杂志社的大门实习。12年后,命运之手使我脱离故土,寄食省作协,用读书说文的方式打发时光。

二

文化宫是老周走出茅屋,坐上火车的中转站,第二年春天,他调到省文联当专业作家(当时省作协还隶属省文联)。按上面的安排,老周暂留简阳农村挂职体验生活。1981年底,我调到文化宫,有条件就近和他交往。我们年龄接近,经历相似,爱好相同,说话还算投机,至今印象深的有几次。

老周的文学梦起于少年。我曾应邀带他转过一回简城南街的两条深巷,说是看院落,其实是重温记忆。上世纪70年代末的简城,大拆大建的序幕还没拉开,街面不宽,房屋低矮,不像现在这样密集。民居以院落为主,格局为临街一条窄巷,石板路,风火墙,一进数院,前后贯通。院坝里偶尔可见豆棚瓜架、古井花台,显得古旧而安宁。院落后面是坍塌的城墙,残土已分割成小

一个作家的执著与纠结

□刘中桥



块菜地。转着转着,老周讲起了少年经历。他念书的石桥镇距简城8华里,两地的民居是同一格局。每天对着爬满青藤的院落,行走在七弯八拐的深巷,听翠竹吟风,看芭蕉滴露,不知不觉就会生出奇想。

老周忙于写作,兴趣不宽,有时为了调剂,才找人喝茶闲聊,话题仍然围绕文学,为一本书、一个细节,勉强坐上一两小时。我记不起他说过什么名言言论,却记得有一次大家提起搓麻将,他表示极端厌恶,认为年轻人不应该沉溺于此。见我默不作声,他以目相示,脱口引了句圣贤话:“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我从不摸麻将,于是借小说家言开玩笑:“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老周连连拱手,好像对这类“掉文”很感兴趣。

有一天,我带儿子在公园散步,无意间碰上老周。他头发蓬乱,眼里布满血丝,看上去异常疲倦,说是赶写“中篇”,昨晚通宵未睡,出来松动一下筋骨。见我牵着儿子,他流露出欣羡之情,自责很少带孩子,没享受过这种“幸福”。老周陪着我们父子俩,边走边讲他和孩子的故事,讲得琐碎碎碎,歉疚而动容。这番谈话,让我看到了一个乡土作家更近乎原生态的一面。老周有许多至情至性,有许多执著深微。

还有一天,老周急急忙忙到我家,一进门就长长地舒了口气,告诉我“中篇”终于写完,这两天锁在箱子里,钥匙交人保管,怕忍不住翻出来再改,要赶紧修整。他瘦了一圈,有气无力地瘫软在靠椅上。我心里冒出“值不值”的疑问。人寿几何,来日无多,艺术的殿堂里却树立着殉道楷模。他们永恒的精神光芒,已突破因果的推论而独立,吸引文苑学子为理想献身。可是今天回头看,老周头上的光环,未必安慰生者。人已了而事未竟,这缺陷该怎样弥补?

三

1979年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开始由《沱江》文艺季刊连载,年底由复刊的《红岩》全文推出;1980年5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播;1981年,小说相继被搬上银幕和舞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既是老周心血的结晶,更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文革”十年浩劫,经济崩溃,文化凋零,拨乱反正后,百业待兴。伴随着思想解放,一批呼唤改革的作品井喷而出,产生轰动效应。《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在那个年代,作家作品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老周被媒体聚焦着,作品则供人指点评说。处在聚光灯下,老周是伤心世态、隐忍于怀,还是感慨多于苦笑,有无针锋相对的过激反应,我不便打听。这段时间,我应约去过一次老周的临时住地。他家在红塔区公所一幢简易楼房的底层,二楼楼梯间是书房,一床一桌,狭小拥挤,床下丢着未开封的邮件,看外形全是书和杂志。老周讲的主要还是文学,有些走神,心情似乎不大平静。

1984年秋,老周举家迁到省文联宿舍。老周到省城,出自上级领导的厚爱和栽培。沙汀等前辈见多了“移植”的负面作用,对“上调”持保留态度。古人曾说,对于花木“其土欲故”(柳宗元)。根据我后来的体会,这的确是见道之言。老周是地道之才,是土地和乡村之子,接近泥土,空气清新,心灵纯洁,想象才会充分发挥。葫芦坝是他的生根沃土,这里的春种秋收、农家欢乐,这里的山月江柳、竹林松风,激发过他的才华,被尽情纵意地写进了作品。有什么必要到十里红尘的都市,再用“挂职体验”、“蹲点采访”迂回而寻?文人扎堆,就是一个小社会。会要开,话要说,各种演讲、研讨、笔会要到场亮相,有些心境,难得再有。

文学的形势发展很快,西方的文艺思潮激流涌入,新一代作者跑步登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返文坛的不少作家,已被视为“落伍者”冷在一边。但是,谁甘愿做一个落后者?谁不想担负“扛旗开鼎”的重任?我估计老周活得不轻松。

由此,我想到了时间的残酷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歌手。一代人说一代人的话,一代人写一代人的书。先行者开路,后继者接力,一波推着一波,当“时代”成为历史,作品随之“定格”。每个阶段的杰作,都是一个波峰,同时又可能是低谷。这条规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尤其明显。时间是存在的冠军,而作家不过是“存在”的参与者,当然情况不尽相同:有的与时俱进,另涌新浪;有的限于举步,原地徘徊;有的好运到头,逐渐湮隐……

至于老周本人,并未止步不前。他的后期小说,题材和手法都有变化,对表现形式的探索越

■ 行走

梅雨潭

□赵瑜

充了寿石对生活单调的想象。他定然长时间坐在潭边玄修,品尝流水和季节的变化,以至于陶醉,忘记了日常生活的饥饿或贫困。

朱自清到了梅雨潭,何尝不是忘记了生活的困窘呢。朱自清1923年接受了温州第十中学的邀请,来做教师,然而因为经济的原因,第二年便又转折至宁波,后又到了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所以,在当时,朱自清经济上的困顿是很明显的。

然而,温州景致的美还是深深地抚慰了朱自清,他在温州期间,写下了散文名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绿》。甚至一直到了1925年的10月,朱自清到了清华大学任教,念起温州和白马湖,还写了一首叫做《我的南方》的诗,诗里这样想念南方:“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地飞扬!”

如今,我们一群人来到了梅雨潭,看到的是秋天的切片。光由淡黄渐向炽白。因为树木茂密的原因,在山洞口那里站着,有风袭来,格外的凉,想来这梅雨潭定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不论是更早年代来此留下诗句的高僧大才,还是民国时期的朱自清,多是贪食这山间水旁的清凉与安静。

离得近了,飞瀑跳下来的声音像极了调皮的孩子在操场追逐时的呼啸声。在山林间奔走呼应最终汇集到这梅雨潭的水流何偿不是一群嬉笑追逐的孩子呢。



■ 讲述

与鼠共舞的知青岁月

□万伯翱

上世纪60年代,我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园艺场第二生产队当知青整整十个春秋。之前,我曾写过我的生产队长和朋友们,今天则写与“野生动物”的“交往故事”。

那时我们二队农工和知青统一住集体宿舍。这一大间宿舍,我们自己动手打好地基,再在自挖自夯的地基上用砖垒砌起来。因为砖当时较为稀罕珍贵,所以常常垒到一半,墙就改用泥坯了,当然也没钱买瓦,就用麦秸或草苇做屋顶了。地面当然无任何铺设,直接是潮湿的黄土。所以,这种房屋构造十分简陋,现在大都市里的年轻人无法想象。这样的房屋两三年后必会“通风透光”,当然还会漏雨。于是,在老师傅的指导下,我们就上房再修补。

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宿舍紧挨着队里的一个粮仓,为了保证粮仓安全可靠,基本上上下下都是砖瓦结构和水泥地面了。但到晚上,一吹灭了灯麻烦就来了。

俗话说:“老鼠生来会打洞。”那时职工因穷困大多没有蚊帐,我母亲让我带了单人绿色小蚊帐,真派上了用场。蚊帐防蚊蝇没有问题,但晚上只要吹灭如豆煤油灯不久,耗子大军就会从洞穴中爬出来,沿着墙根,从“总部”隔壁粮仓发着“吱吱”的呼叫声,成群结队潮水般出动到我们屋里。

那时“三夏”、“三秋”后体力劳动十分繁重,都是在龙口夺粮嘛,煤油灯下读了个把小时书后,很快上下眼皮打架,支撑不住就上到我们自制床上青纱帐里进入梦乡了。开始入睡时,也听不到耗子大军前呼后应的出动声音了。但是这些嗅觉灵敏的地下部队在这黑夜中却大显身手,它们不但熟练高超地沿着拉蚊帐的铁丝飞快奔

跑来回,到了我的小帐顶放开手脚放肆地手舞足蹈起来,更有甚者还钻帐而入,我感到了它们扎人的胡须。让我骤然惊梦而起,拳打脚踢击退帐内帐顶大小鼠军,像京剧《三岔口》夜斗,我手掌曾接触到它们毛茸茸、呈锥形、拖着大尾巴的身体。这些嚣张贼鼠虽小,绿豆眼却闪着令人害怕的绿光。

第二天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酸痛的双眼随保管员打开粮仓门查看它们的大本营。在梁上,大小老鼠警惕地张望着,随时准备逃窜,但因为有高空优势,却也不太慌张。这正如唐诗所写:“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更古老的《诗经》则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可见其同伙田鼠也是很可恨的。上世纪50年代“除四害”,如今麻雀已正了名,但这老鼠,和贪盗国家财物的贪官污吏一样,必遭人喊打呢!但当时怕下药后污染屯粮,我们改用鼠夹鼠笼应战,也狠狠打击了不可一世的鼠敌,着实让我们夜晚稍停放心入睡了一阵子。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农场都没有养狗、养猫的农户,鸡鸭等家禽也绝对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之列。

全世界老鼠种类竟有450多种,它们的始祖“东方晓鼠”,据查竟有五千万年的历史。它们生命力极其顽强。1986年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了大事故,近9.5万人死亡,但动植物皆死亡的3年后,老鼠不知从何洞穴内爬出,又复活了,据说更加肥硕壮大了。它们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多灾祸。当然,供应人类做各种科研的特种定向培育的小白鼠,则对人类大有用处,因为老鼠基因序列和我们人类差异不多。



来越执著,精雕细磨,郑重严密,却也拘谨了。言为心声,难道他有什么顾虑?据说老周生前有部几易其稿的《饥饿平原》,为何改而不定?我揣测还是盛名之累,惟恐不能尽如人意,瞻前顾后,处处妥贴,把作品成败与荣辱毁誉的关系拉得过近。老周已矣,这部书稿也下落不明。

四

1990年8月5日凌晨,老周病逝于省城,享年不足54岁。在那一年的2月,他刚出任《现代作家》主编;3月,被任命为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6月底,担任四川省作协常务副主席。6月8日,他率杂志社全体人员回简阳,听取读者对办好刊物的意见。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病容明显,还须强打精神,全力以赴。由专业作家到省作协领导,诚然是靠作品的力量,众望所归,合不合适,又当别论。老周体魄不够强健,天性好静,默守古风,不耐烦嚣。当时“市场”已全方位介入社会生活,要想实际做出些成绩,已经不是那么容易。老周拙于炒作,不擅长接待推销,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处理具体事务,其能力远逊于运笔。不管他想如何超脱,有时还是容易感情用事,适时应变的才干究竟有限。世间万物,各有方位,雁排长空,鹤唳九皋,虎啸深山,凤鸣朝阳。一个人最能哪一方面一展长才,大致有个界定。老周原路而行,会不会更好呢?

2000年7月,老周辞世十周年之际,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周克芹文集》。封面上的老周侧身回视,欲语无言,是一个儒雅的中年文人形象。这张照片,把他的个性、风采和信念留在了。

老周等一批作家所代表的文学精神,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市场这个东西一旦形成气候,会对文学造成极大的冲击。对于老周来说,中国新时期文学史接纳了他,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列着他的作品,家乡的文化广场给他竖了纪念像。文化广场西向东,朝霞夕晖降老周永葆热度;广场与葫芦坝隔水相望,父老乡亲能欣赏到老周的存在。

离得远了,通过山洞来看梅雨潭的瀑布,会发现,那光将绿分成了无数个层次,有深绿的夏意,有枯黄的秋意,以及在山体阴影下模糊的鹅黄绿,和浓黄不同,和枯黄也不同,鹅黄绿是油画中将绿和突出的那一抹,是遥看丰满近看无的一种过渡颜色。

一些泛黄的叶子,在梅雨潭里漂浮着,一会儿,便被水冲到了潭水的四周,叶子泛着深秋的浅黄或深红,如潭水的眼睛一样,眨着,闪着光,有一瞬间,一片叶子正好被一缕阳光投射,那让你惊艳的色泽来不及与别人分享,叶子又漂远了。就那样又在潭水边站一会儿,等着光照在叶子上,一直等着,却再也没遇到。世间的事大多如此,痛苦也好美好也罢,有时候只能存于内心,无法掏出来和别人分享。

温州本土的友人向我们介绍石刻上的内容,最早的年代是宋时,刻的内容却是一首唐诗。而最晚的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张宗祥,题刻了“飞白”二字。

我们便找了一阵子飞白,梅雨瀑布从高处飞来的样子,不就是在宣纸上写大字时的一段飞白吗?这两个字用得真好。是飞白的水降落在树影里,水本来是色无味的,它的绿是树的绿,它的飞翔是我们观者每一个人内心的飞翔。

大概不是周末,游人不多。我们一群人坐在自清亭里闲聊,想象着1923年朱自清来到梅雨潭时的情形。那时,朱自清的寻访,自然是坐船来,一路听船家摇着橹杆,看着两岸人家的冷暖,又想到家里让他内心柔软的孩子,不由得将眼前的梅雨潭比喻成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而他呢,是想亲吻她一下。

于我而言,深秋的梅雨潭,多了几分冷冽,我更觉得她像是一个夜场唱歌的女郎,繁华、苍凉。那飞来的声音里藏着几多内心的戏份,或者身世的飘零,或者世事的无常。好在,听者都是安静的,都是喜欢秋天的。喜欢这一潭水里的秋,喜欢这满山鸟鸣的秋。

秋天的梅雨潭也是绿的,青翠着的绿,密集涂染的绿。我第一次来,便被打动了。